

略述诸子散文的艺术性

季镇淮

从春秋晚期到战国时代,产生了新型的记言文,即诸子散文。从商、周王公之辞到春秋时代的卿大夫之辞,到战国时代的诸子或游士之辞,反映着不同的历史时代的变化。

诸子散文是记言文即说理文。它们的形式从语录体发展而为专题论文,一般表达方式和语言表现了鲜明的艺术特点。

代表孔丘思想的《论语》是孔丘和当时一些统治者及其门徒谈话的记录,大约到战国初由再传弟子编辑起来的,因为记录非出于一人一时,所以全书在形式上并不一致。前十篇比较简单,大抵三言五语,仅存片断。后十篇则较为丰长,往往有大段的议论。一般用语简练,富于内容。《季氏将伐颛臾》是较长的一章,记孔丘与冉有、季路关于季氏家族(康子)将要攻伐颛臾的谈话,真实地表达了孔丘维护周室分封制度、反对兼并战争而提出改良主义的政治思想。人物对话口吻,神情态度,都写得逼真。有不少章节往往写出生动的谈话场面,活跃的人物性格。如《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路从而后》等。《论语》里有些人物形象是鲜明可见的。

代表墨家思想的是《墨子》。此书也非出于一人一时之手。其中《耕柱》、《贵义》等五篇,和《论语》的形式相近,是墨翟及其门人的言语记录。这一部分产生的时代可能早些。《公输》主要记录墨翟阻止公输盘和楚惠王(公元前 488—432)攻伐宋国的谈话,具体地说明了墨翟一派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精神。人物对话,有简括,有铺陈,形象具体生动,是少见的一篇。另一部分如《廉爱》、《非攻》等等,是墨翟学说的中心,不是语录体,而是墨家各派表述墨翟学说的论文。它们标出了题目,用事例申述一个集中的论点。这一部分大概产生于战国时期。《墨子》文章一般反复说理,条理清楚,有逻辑性。语言朴实、明晰,流畅不足。

孟轲、庄周的散文表现了诸子散文的新发展,它们的艺术性都是很突出的,为宣扬作者一整套思想体系服务的。《孟子》还是语录体,传说是孟轲晚年和门人万章等共同著作的。它虽然还是无系统的孟轲游谈的记录,但已铺张、丰茂得多,远非《论语》可比。《齐桓晋文之事》是一个长篇,记录孟轲和齐宣王(公元前 332—314)的一次谈话,集中地表达了孟轲的“仁政”思想。孟轲自称“知言”,善于听别人的说辞,也善于向别人陈述自己的主张。这篇记录表明,他不是把自己的“仁政”思想直接地概括起来而加以论述,而是曲曲折折,用种种事例由浅入深、由近及远,把它引导出来,使听者一步步地落入自己的思想圈套,以达到宣扬自己主张的目的。而所用事例又都是具体的、熟悉的、切合的。从眼前小事件、常识以至引经据典,随机应对而不离其宗。往往欲擒先纵,引而不发,直到事理已明,才一语道破,使论点明确无疑。通篇语言明晰流畅,意无

不达;态度从容,自视甚高:表现了典型的游士风貌。这是一篇记言文而富于形象性,人物对话神情毕露,口吻逼真,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活跃生动。

孟子散文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语言形象化。他善于针对不同的谈话对象和场合,随口运用各种譬喻,表达自己的思想,往往类比鲜明,矛盾突出,叙述和譬喻的结合既自然,又使内容显露无遗。这无须举例,书中随处可见。他还用扩大的譬喻形式即寓言故事来说明一理,如用《齐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说明当时求“富贵利达”的游士的可鄙,有细节、场面,有人物活动和刻画,实际就是后世“小说”的雏形——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饗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饗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媵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徧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墻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又之他;此其为饗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妻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

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

——《孟子·离娄下》

此外他还往往借助历史或把传说和神话当成历史来讲明他的道理,这是“法先王”的儒者所惯用的手法,特别是孟轲以“闲(卫)先圣之道”自命,更讲得详细、具体和生动。

《庄子》也是庄周一派著述的辑录,其中不少是庄周和时人或其弟子谈话的记录,也有许多是论点集中的论文,很难区分那些是庄周自己作的。每篇都有题目,大概是后人加的。实际往往又不是完整的一篇,而是若干片断的集合。庄周一派的散文是庄周主观唯心论最巧妙的表现形式,就是“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表示其对事物的主观唯心的看法。它们的一个无可比拟的特点,就是“寓言十九”,把他们的“道”寄托在大量的故事里。诸子各派都自觉地把道理讲得具体化、形象化,庄周一派运用这一方法为繁复、奇特,以至于玩弄、滑稽。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辄乎?……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闲,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闲,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于。……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庄子·养生主》

这个庖丁解牛的故事,借以说明养生的道理,必须在现实生活中善于避开矛盾,自由自在。它所写的厨工长期宰牛的实践经验有其真实性和生动性,这是诸子散文中少见的对事物的具体描写,是它艺术上的独特的成就。但根本的问题是它把厨工宰牛的实践经验夸大和歪曲了,使之神秘化,以达到其主观唯心主义的结论。这种手法在庄派散文中是屡见不鲜的。往往取材于实际生活,如木工的斲轮(《天地篇》)、石工的斲石(《徐无鬼篇》)、铁工的锻钩(《知北游

篇》等,通过故事化,而把它们夸大歪曲为神秘莫测以至根本无所用心的表现,从而表现其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是庄周一派散文的一种艺术手法。

庄周一派也往往用历史事件,传说或假托历史人物的故事来讲述他们的道理,有其揭露私有制的罪恶及其道德的虚伪的现实性和深刻意义,而主要的是借以证明他们厌恶和逃避现实、反对历史潮流是合理的,从而证明他们“绝圣亲知”、蒙昧主义世界观和倒退主义历史观的绝对正确。他们还选了许多荒诞的、浑沌愚昧而神奇的古人古事。庄派散文,语言丰富,想象奇异,善于夸张和形容,突出事物的矛盾,表现了独特的、生动多采的形象。

《荀子》是荀况自著,其中有错简,有少数篇是别人加入的。它脱离了语录体的影响,表现了专题思想论文的完整形式。作者也非常注意语言的形象化,使道理能表达明晰,如《劝学篇》几乎绝大部分是用譬喻说理的。同时他也研究名词或概念的涵义与实际的关系,主张“名空而实辩”,“制名以指实”,注意语言表达的准确性。特别著名的是他提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论辩方法,就是立论不仅要有根据——现实、历史或科学的知识,而且要讲出其所然以证明一理。他反对名家人物利用抽象的概念而歪曲具体事物,进行诡辩,如“杀盗非杀人也”之类。荀况文章,一般表现宏富、深广,忌繁周密,分析详尽,逻辑性强,语言雄健有力。

《韩非子》是法家学派的政论文集(少数篇有真伪问题),形式比较多样化。《解老》等是用故事阐明《老子》的玄谈思想的。有长篇的政论文,也有短小的论辩文。论述详博,思维谨严,亦时时用寓言故事或历史传说以阐明其论点。还有不少就用寓言故事以说明一理。如《外储说左上》,有一段借墨家的口讲秦伯嫁女、晋人卖珠的故事,指出“言淡者”讲求华而不实的言辞是无用的,当权者不要轻信他们说得好听的那一套,要看他们所讲的内容。韩非文章,态度严峻,内容弘博,说理深刻透辟,又多用寓言故事使道理浅显明白,是显著的特点。

由西汉人刘向整理并定名的《战国策》,是战国时代游士说辞的总集。它所保存的许多故事,虽然是片断的,无系统的,但包含着当时所有主要国家和几个残存小国的历史事件,时间长达二百四十余年,上接春秋时代,下至秦之统一,是探讨战国历史一种重要的文献。它的取材,主要游说家针对现实政治斗争问题向统治者出谋划策,有长有短,往往纵横议论,铺张明快,表现了时代色彩和游士们的言谈风貌。如《苏秦为赵合纵说齐》,《张仪为秦破纵连横》等。又如《触誓说赵太后》,是触誓向赵国统治者赵太后(赵惠王妻,孝成王母)的说辞。主旨在告诫统治者:子孙的无功之尊、无劳之俸是不可仗恃的,必须使他们建立功劳,否则或早或晚都要遭到覆灭的下场。毛泽东同志指出:“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深刻地概括了春秋战国以来历史趋势的本质。各国新兴的地主阶级及其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不断地在进行,统治者不断地在更替,实质是各国统治阶级的权力和财产不断地再分配。这篇说辞的方法也值得注意。战国时代游士向统治者献计,一般要讲究方法。怎样使统治者听得进去。触誓先说老人闲话,好像不再谈长安君去齐为质话题,以平息赵太后之怒。而后说到自己的儿子以启发赵太后谈话的兴趣。而后自然地谈到赵太后对待儿女的态度不同,及时夹以议论,提出主题,指出其错误,以达到说服赵太后的目的。全篇对话,接近口语,明晰流畅,表现了生动的人物形象。

春秋时代,奴隶主贵族讲究外交说辞。从春秋晚期到战国时代,各派游士展开空前的论争,

讲求怎样论辩,以期说服对方,是共同的倾向。经过三百年的发展,语言形式上从语录体到专题论文。它们都是记言文即说理文。理是各派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而对事物的抽象的概括,即理性认识。由于思想和政治斗争的日益激烈和发展,各派逐渐明确了说理要有正确的思维才可能正确地表达思想,这样就产生了思维规律的研究,用正确的概念、判断和推理的过程来阐明一理。同时还要有实证的事物和思想资料。另一方面为使事物表达透彻无遗,就运用各种形象化的方法使之具体和明晰,这就是大量的譬喻以及寓言故事的由来。这样,诸子散文一般具有逻辑性和形象性综合的特点。

用譬喻说理,即语言形象化,在殷周记言文中就见过。但战国时代则是诸子在辩论中形成的共同的表现。《墨子·小取篇》说:“辟(譬)也者,举也(他)物而以明也。”荀况也说“谈说之术”要“譬称以明之”。又《说苑·善说篇》(卷十一)有一个故事——

[梁王]谓惠子(施)曰:“愿先生言事,则直言耳,无譬也。”惠子曰:“今有人于此,而不知弹者,曰‘弹之状何若?’应曰:‘弹之状如弹。’则谕乎?”王曰:“未谕也。”于是更应曰:‘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则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说者,固以类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知]矣。”王曰:“善!”

这个故事,说明了譬喻的作用,也说明了战国诸子运用譬喻以及寓言故事的自觉性。但是运用譬喻说理只是一种表达方法,根本要看说的是什么“理”。荀况已指出:“辩说譬喻,齐给便利,而不顺礼义,请之奸说。”可见荀况当时已注意到语言形象化要为正确的内容服务,而不能只听他说得好听。阴阳家鄒衍对平原君也说过当时游士说辞“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享,巧譬以相移”的诡辩技巧,玩弄文辞譬喻,话说的好听,而歪曲事物真相,以达到宣扬其邪说的意图。

春秋战国时代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各国交往频繁,大城市兴起,农业、工商业发展,科学技术进步,新事物、新思想不断涌现,这必然是促进语言发展的新时代。诸子散文以多种多样的形式表现了这个时代丰富的、新鲜的语言。由于诸子散文是在游说、讲学和论辩中产生的,它们一般是在口语的基础上产生的。流畅自然,活跃生动。郭沫若先生论战国时代文体变革说:“以散文而论,文体的特征是多用语助辞,……如焉哉乎也者,其实就是当时的口语声调”。又说:“比文,‘孔子者圣人也。’‘者’字古读‘啞’,‘也’字古读‘呀’,就是‘孔子啊,圣人呀!’和现在的口语也并没有什么不同,这是我们要认识的一点。”郭先生的论述,具体地说明了诸子散文一般口语化的特点。

诸子散文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长远的。但遭遇各自不同。汉代辞赋和春秋贵族卿大夫外交的辞令以及战国诸子特别是游说家的说辞有直接的关系。西汉以后,由于封建统治者独尊儒术,《论语》、《孟子》先后成为圣人的经典,影响深广久远。《庄子》的思想,连同他们奇特而丰富的想象和语言,自魏晋以后在文学和士大夫生活中发生了广泛而长远的影响。而《荀子》和《墨子》则长期地被禁锢,到唐代开始为古文家韩愈所重视,给以很高的评价。之后直到清中叶又开始为考据学者所注意和研究。《韩非子》的遭遇也和荀、墨相似。唐宋古文家对诸子文章的取法是比较广泛的。《战国策》的文章对古文家也是有影响的。